

春 色 满 园

——广东省高校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
征文比赛获奖文集

广东省高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编
一九九九年九月

春色满园

——广东省高校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
征文比赛获奖文集

广东省高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编
一九九九年九月

序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高唱凯歌，突飞猛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日升月恒，绚丽辉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邓小平理论，已被 20 年的胜利实践证明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广大青年学生正如饥似渴地学习邓小平理论，并试图运用这一理论释疑解惑，作为他们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一把钥匙。

为了进一步组织青年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的理解，广东省高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简称关工委）于今年上半年在全省高校举办青年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征文比赛活动。这次活动得到了各高等院校和莘莘学子的积极响应，“关工委”收到了大批应征的论文，经过专家评选，评出优秀论文一等奖 5 篇、二等奖 11 篇、三等奖 22 篇。这本小册子，就是这次征文比赛的获奖文章汇编。

获奖的青年学生，有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他们所在的学校，有国家和省的重点大学，有普通高校，有专科学校，也有民办高校。参赛的面如此之广，参赛的人如此之多，都是过去所少见的。

在 38 篇获奖文章中，从内容上看，涉及到邓小平理论方方面面。有从邓小平的政治构想中提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思路；有从社会主义的历史形态演变中讨探邓小平理论的新特点；有对邓小平的创新精神、开放思想、社会主义人才观，独辟蹊径，议论风生；有对邓小平的重视农业、科教兴国和共同富裕观点，体会尤深，妙语连珠。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有的非师范生运用邓小平的教育是立国之本思想，大谈教育改革问题；有的非农

科生学习邓小平的农业是基础思想，大作关于农业发展的文章。这些文章绝非泛泛其谈，确有真知卓见。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广大青年学生的头脑中，成为他们人生观、世界观的精神支柱。

从获奖文章的体裁形式看，有围绕社会主旋律的长篇大论，采用传统的论说文写作手法，铺陈演绎，夹叙夹议，洋洋洒洒；有对社会热点问题一事一议，说一孔之见，谈一得之功，短小精悍，掷地有声；有取之于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翔实纪录，白描素写，使人看得见摸得着，从而更加觉得邓小平理论亲切感人；也有的采用散文、诗歌形式，纵情礼赞改革开放，自由抒发对邓小平的崇敬之情。总之，不论是宏文巨制，还是短篇小品，作者都是通过自己的视角，阐述自己的见解，使用自己的语言，流露自己的真实感情。

当然，作者都是在校学生，不是专职研究人员，甚至多数不是学习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所以对他们的文章不能苛求。他们有些观点可能不够稳妥，有些理解可能出现偏颇，但只要总的精神不错，大的方面正确，就应该鼓励，不必求全责备。我们祈望本集的出版对广大青年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有所促进和帮助。

由于本集篇幅所限，对部分文章的文字作了压缩，谨此说明。

编者
1999年8月

目 录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思路	
——邓小平政治发展思想探析	
.....	杨爱平 蔡俊豪 何艳玲 甘黎明 (1)
从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形态和动力结构看邓小平理论	
——论“建设”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结构形式	
.....	朱正国 贺林森 (10)
试论邓小平的创新精神	
.....	蒋慧丽 (19)
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	
.....	陈永祥 张宇权 许倩 (27)
发展才是硬道理 金琳 (35)
改革开放——中国强盛之路 郭智泉 (41)
漫长的探索和实践	
——学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感	
.....	杨扬帆 (46)
邓小平的改革观与社会实践 张育广 (49)
继承和创新	
——学习邓小平的党建理论	
.....	李维强 (54)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	
——从广东的实践看我国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	陈世军 (59)

浅谈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	梁海霞	(65)
浅析邓小平理论中的价值观	林晓红	(68)
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与知识经济	洪莹	(73)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	陈志坚	(77)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与高校师资建设	曹建伟 侯婧	(82)
树立社会主义的人才观		
——学习邓小平关于人才的论述有感	任永林	(86)
论邓小平理论的“农业是根本”	何东芝	(89)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根本	黄建东	(94)
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不动摇	徐南飞	(98)
优先发展教育是邓小平一个重要的思想	涂佩贤	(101)
对教育现状的思考		
——学习邓小平教育理论的几点体会	邢晋宇	(104)
美之花呼唤浇灌		
——关于加强师范生素质教育的刍议	詹凡丰	(110)
跨世纪的曙光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比较	陈金华	(115)
论坚持对外开放		
——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心得体会	吴海育	(122)

敞开“天朝”的大门	
——读《邓小平文选》有感张皓 (126)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再创社会主义建设新辉煌	
——回顾改革开放 20 年的光辉历程姜国梁 (129)
谈谈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黄巧芳 (132)
光辉的旗帜王舰红 (138)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事求是”	
.....方伟文 (141)	
敲响大学生拒腐防变的警钟郑秋凯 (144)
心灵的净化 灵魂的升华	
——重读《共产党宣言》有感向华 (150)
明天会更好	
——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文有感	
.....冯晓蒙 (154)	
我身边的邓小平理论黄志宇 (156)
世纪畅想江婷 (159)
不悔故乡行韦连玲 (161)
小村的故事马扬先 (164)
春天的故事林玉昆 (167)
一个老人的愿望周运华 (169)
附录：广东省高等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关于我省大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征文比赛	
评选结果的通知》 (173)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思路

——邓小平政治发展思想探析

杨爱平 蔡俊豪 何艳玲 甘黎明

“政治发展”一词是个“舶来”概念，西方政治学界不同的学者对其作出了各自的诠释，形成了颇为丰富的政治发展理论。然而总的来说，这些理论很难嫁接于广大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生动活泼的政治实践。现实中西方政界和学界希冀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强行输出自己的政治发展模式和目标以构建政治“大同世界”，这种做法正日益面临“水土不服”的尴尬局面。究其根本，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明显的偏狭性印记。这种偏狭性认为：根基于深厚的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西方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必然普遍适用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如果西方先发性现代化国家成功地经过了历史上的某个阶段而有了今天发展的政治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应该照搬照套，而不管这些国家具有何种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显而易见，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做法违背了政治发展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二者不可割裂的内在规律。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政治发展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一个作为实体的国家（社会）具体的自主发展过程。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和设计师，其政治发展思想虽未体现为文字上的长篇大论，但脱出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和实践中盲目趋

同的窠臼，展示了他特有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性和民族性情结。他认为：“西方的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综观邓小平关于政治发展的整个思想脉络，我们可以看出，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政治发展“由谁领导——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的战略思路，邓小平博大精深的政治发展思想体现了最大的“中国特色”，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

政治发展必须有一个发起者、组织者和主导者，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和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超大社会，对于政治发展过程的驾驭和把握程度，无疑取决于过程的领导力量的成熟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器和领导力量，邓小平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主导与核心的地位与作用，多次申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在邓小平看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最根本历史条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8年民主革命，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政治革命的成功，换句话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政治发展采取的形式是政治改革而非急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这一过程中可否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呢？邓小平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是发动和领

导政治革命、实现政治关系质变的决定力量，而这种历史形成的领导地位更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而统一规划和分步进行。

2.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组织保证。政治发展在外延上包含政治体制、政治过程、政治主体、政治文化的发展等诸多内容，因而政治发展的过程一般又被认为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政治学的有关研究表明，民族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政治要求是，社会能否产生一个精明强干的核心阶层并推动变革，而中国近代正是由于缺乏这个核心，过去的现代化努力均以失败告终。邓小平从宏观上论述中国共产党是四个现代化的组织保证，实际上就是强调了共产党在实现政治现代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四个现代化？”我国政治社会文化传统色彩比较独特、社会结构交错复杂、人们利益诉求多元而政治资源相对贫乏等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发展中领导核心和组织核心的地位，更加凸显了其在我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政治文化重塑、多元利益诉求整合、社会阶层关系协调、政治资源统一调配等方面的组织作用。

3.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保持政治稳定的需要。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既是政治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又是政治发展的目标之一。如果没有政治稳定作为保证，就会导致政治发展过程的中断或向传统政治状态的回归，基于对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建国后历史发展的冷静思索和分析，邓小平反复强调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因此，“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秉承邓小平的历史洞见，党的十五大在政治报告中再一次强调：“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政治稳定。”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来说，实现政治的稳定和有序最根本的是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

治领导系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的团结的政治局面。”后发性现代化国家在走向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党的强大与政治稳定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良性运作中所发挥的强大作用，印证了这一结论。

二

发展中国家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发展往往面临着艰难而困惑的二难目标抉择：是抛弃“本我”而完全政治“西方化”，抑或是照顾民族实际的政治发展“本土化”？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什么”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邓小平果断地选择了后者。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绝非全盘“西方化”，政治发展也绝不能忽视特定的社会现实而去追求在异国他乡成长起来的模式和目标。“现代性”的精神是一致的，但表现这种精神的形式则是多元的。基于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源远流长的政治发展的历史反思，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殊国情的现实考虑，邓小平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回答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什么”的问题。

1.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界域。政治发展绝非“信马由缰”，它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界域问题。政治发展的界域在本质上指的就是政治发展的旗帜和方向，或者说，政治发展必须有一个既定的边界和限度。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次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固有界域，此后在很多场合他又多次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概括以及由此形成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其作为全新的政治标准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是党和国家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我国政治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水平，而不

是向西方资本主义政治靠拢。邓小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必然的界域选择；如果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就会引起动乱，以致危及整个现代化事业；如果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无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如果动摇了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发展就失去了主导核心和组织保证；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就失去了伟大的理论指导。因此，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2.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明确目标。与政治发展的界域相适应，邓小平从战略性的高度论述了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问题。众所皆知，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在提出政治发展的目标时，总是渗透着一定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理念。邓小平提出的政治发展目标，冲破了传统政治思维的桎梏，具备两大显著特征：其一，从追求完美至善的“理想国”的政治理想主义走向正视现实政治动力和政治资源的政治现实主义；其二，由古典政治学的价值理念过渡到现代政治学的工具理念。纵观邓小平政治发展思想的演进历程，其政治现实主义和工具理念的内在特质更加浮出水面。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邓小平谈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清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通过改革，处理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同年9月9日在会见波兰客人时，邓小平更为明确地提出政治发展的三个目标，他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党的十三大立足于邓小平政治发展目标的总体构想，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

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加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机制。”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专列一节谈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使政治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更加凸显。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新治国理念，同传统的人治型政治发展取向走向决裂。

3.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内容。政治发展的过程，从某种视角来看，是制度变迁和制度发展的过程。换言之，政治发展是通过改革和创新国家的制度安排来塑造和再组新的政治关系的过程。制度安排可分为基本的制度安排和普遍的制度安排、有形的制度安排和无形的制度安排。与其一贯主张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超越的政治界域相一致，邓小平始终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其他基本制度安排是坚决不能动摇的。在此前提下，政治发展的内容体现为有形制度安排和无形制度安排的普遍革新。

在有形的制度创新层面，政治发展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运行机制三方面内容。我国在原有的全能主义政治形态下，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与基本政治制度存在很多矛盾和脱节，成为政治发展的“瓶颈”和体制性障碍。对此，邓小平提出从具体制度、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上解决中国政治发展实践中的问题的重要思路。他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颜换色，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精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等重点篇作，邓小平关于有形的制度创新的内容跃然纸上，主要包括：科学配置权力，领导体制改革，理顺党政、政企、政社关系，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机构改革，等等。

在无形的制度创新层面，邓小平提出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尊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好的成份的基础上，肃清和

祛除那些同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为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但“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普遍潜存的封建主义、官本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流毒。这些都属于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范畴，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容只有涵盖这些非物质因素，针对性地实现政治主体的精神现代化，政治发展中的有形制度创新才有实质性意义。

三

邓小平的政治发展思想最终落实为“如何发展”的问题，即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抉择和途径依赖问题。邓小平以其特有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亲和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具体解答，构成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由应然态向实然态转化的直接指导。

1.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抉择。所谓政治发展的模式抉择，在本质上是政治改革与发展和经济改革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关于经济和政治的整合关系，不同流派的政治学观点有着基本的共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比较政治学的代表人物阿尔蒙德则认为：“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事实上，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是一种共生的现象，二者在发展中呈现出一个互为前提条件的相互作用过程。

基于经济与政治的密切相关性，邓小平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应该走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适应、相互配套的优选之路。1986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

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也行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他认为，如果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跟不上，则“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后腿。”因此，“不改变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然而，囿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环境的限制，加之政治改革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开放改革以来，我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一直滞后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于是，在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了“先后论”、“寓于论”、“融合论”等模式选择。这些主张可归纳为“缓行论”，实际上没有充分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未能确切把握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共生、互促的模式抉择的思想。与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相配套，我国当下正进行着机构改革“第七次革命”，这再次证明了邓小平关于政治发展模式抉择战略的正确性。

2.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途径依赖。政治发展的途径有两个基本类型，一是政治统治系统内的领导层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自觉改革型，二是微观政治主体共同促动的由下至上的自发“革命”型。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前者适宜于具有特殊文化传统因素的国家，后者则植根于具有普遍主义文化基因的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典型的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和东方式的政治心理依然存续，加之地广人多引起的政治资源供给不足，决定了国家的政治发展只能是以共产党为主导、以政府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自觉改革过程，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质言之，我国的政治发展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的发展，“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一部分人对政治发展途径依赖的混乱认识和摇摆不定的行为倾向，邓小平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强调“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

非乱不可。”勿庸置疑，人们“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西方政治实践中的议会民主、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只是代表了西方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但不具备全世界意义。因此，如若选择西方式的由下至上的自发型途径依赖，则中国的政治发展事业只能“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研究生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会)

从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形态和 动力结构看邓小平理论

——论“建设”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结构形式

朱正国 贺林森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理论有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等人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形成以后又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人类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科学社会主义要反映时代的变化和精神也就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那么，科学社会主义有哪几种理论形态呢？从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形态学角度看，邓小平理论或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何种理论形态呢？

一、邓小平理论是建设的社会主义理论

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历史形态。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基础是资本主义。它主要是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科学分析矛盾运动的规律和趋势，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代之以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并说明了实现这一社会变革的基本途径、手段和社会力量。至于资本主义具体是如何灭亡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方式以及如何根据变化了的